

植入与融合：近代移民对青岛城市文化的影响

柳 敏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9)

摘要：近代青岛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成为不同文化交相汇聚之处,海外移民植入西方的物质文明、管理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政治精英移民主导了城市规划与制度文化建设,旅青学者引入了高雅文化,乡村移民传承了乡风民俗。在异质文化的植入过程中,控制、适应、交融、渗透逐渐成为移民应对文化困境的主要方式,并形成青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但海外移民、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流动性较强,一定程度影响了青岛精英文化的扎根与制度文化的延续;而大量乡村移民和经济精英成为青岛常住居民,给青岛带来务实与朴实的城市品格。

关键词：植入;融合;移民;青岛;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4-0037-06

城市文化是各类不同文化相互冲突、动态整合的产物,人作为不同文化形态的主要载体和创造者,在城市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承问题上,学界研究更多关注对象性的文化形态和机构性的城市规划,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民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从近代青岛城市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来看,不同移民群体在城市文化形成和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体现在物质、行为及理念等层面),另一方面,因不同移民群体所掌握资源和居住时间的差异而导致不同文化形态在传播效果方面存在区别。这种差别促使我们思考精英移民与底层移民在城市文化建设与形成中的作用,并理解不同文化类型(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在城市中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境遇。

一、多元异质的青岛移民

开埠前的青岛居民基本全是业渔、务农者,自德占以来,近代青岛实行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

体系,乡区基本沿用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市区无论是物质外观、经济结构还是人口构成、生活方式均发生深刻变化。近代青岛的城市化进程是由德国侵略者强行启动的,在此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层面的发展进程中,政治力量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给青岛打上强烈的异域文明的印记,同时,由于晚清政治局势的突变,民国时期山东各地灾荒匪患侵扰不绝,人口流动频繁。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转运贸易与轻工业的发展,使得来自各地的移民群体源源不断进入青岛。青岛市区的中国人口从1902年的14905人^{[1](P193,233)},到1913年达53312人^{[2](P165)},1927年为133500人^{[3](P234-355)},1936年达216836人^{[4](P6-7)},1946年为288581人^{[5](P6,88)},青岛人口主要由外国移民、各地精英移民和山东农村移民三部分组成。

近代青岛先为德国强占近17年(1897-1914),后又为日本两度占领达16年(1914-1922,1938-1945),外籍移民陆续侨居青岛。初期以德国人为

收稿日期：2016-05-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70034),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DSKL140720)

作者简介：柳敏(1974-),女,湖北武汉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主,军政商等各界人士在德占时期约 2000—4000 人,一战后日本人陆续移民青岛,从德占时期的约 200 人,渐增至 20000 余人。作为著名的避暑胜地和商贸的自由港口,青岛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国侨民总数从 1902 年的 767 人,到 1913 年的 2400 多人,1916 年为 14732 人,1927 年为 13928 人,1936 年为 15942 人,1943 年为 43537 人^{[6] (P43-44)},除日本占据时期外侨占 10%—20% 不等,其他时期在 5% 左右。截止到 1946 年,尽管日本人多被遣送回国,但生活在青岛的外国侨民尚有 2547 人,来自 40 个国家^{[5] (P6)}。总体而言,近代青岛的外国移民人数并不多,但作为城市开埠早期的统治者与规划者,德、日移民植入西方的物质文明、管理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借助强大的资金注入、威权的政府与司法力量强制推行其城市治理规范,开办诸多近代企业,对青岛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青岛开埠以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些商人、买办、学者、政客定居或寓居青岛。对青岛城市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有三类精英移民,一是避难于青岛的清廷要员和就职于青岛的重要官员。辛亥革命前后避居青岛的前清贵族官僚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恭亲王溥伟、两江总督张人骏、学部副大臣劳乃宣、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湖南都督谭延闿、驻德公使吕海寰、督抚大员周馥、军机大臣吴郁生等 100 余人,此外,1920 年代来青岛购置住房的还有于式枚、康有为等。1930 年代受国民政府任命的青岛市政官员亦以其远见卓识为青岛文化发展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如青岛市长沈鸿烈、教育局局长雷法章、农林事务所所长凌道扬等。二是国立青岛大学创办后移居青岛的知识精英,如蔡元培、杨振声、赵太侔、何思源、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老舍、洪深、王淦昌、童第周、黄际遇、蒋丙然等。1930 年至 1937 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任教者达 173 人,几乎全部来自外地。^{[7] (P62-86)} 另外还有大批专家学者来青寓居,如王献唐、王统照、宋春舫、艾芜、萧军、萧红等。三是伴随青岛经济发展而前来投资的各地工商业人士。德日占领者将青岛打造为商贸港口与实业重镇的定位给青岛工商业发展带来坚实的基础与美好的前景,各地商人、技工自青岛开埠以来即源源不断移居青岛。这是一个经济实力不同而地域来源广泛的群体,既有早期各地移居青岛的买办,如何永生、丁敬臣等人,也有经营商店与运输业的各地商人^{[8] (P62-63)},更有来

青岛创业的企业家。他们成为后来青岛商贸界和实业界的翘楚,如建立华新纱厂的周学熙、开设华昌铁工厂的隋石卿、组建青岛振业火柴股份公司的丛良弼、创办冀鲁制针厂的尹致中、开设义聚合钱庄的王德聚、创办阳本印染的陈孟元等。

农民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这样的职业结构使得近代青岛在奠基与发展初期均由农村移民构成其居民主体。1891 年章高元部驻守胶州湾期间,从内地农村招募了大批破产农民到青岛从事兵营、炮台和道路等的修筑工作,德占时期港口与铁路的开工,船舶修理厂、胶济铁路机车厂、砖窑厂等企业的兴建也急需引入相当数量的苦力,城市早期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均来自山东农村。至日本占据后纺织业有初步发展,农村妇女进城人数增加,而国民政府接手后各类工商事业更有长进,工人与商业服务群体日渐壮大。1931 年青岛市区的本地人口仅占 11%,而山东各县移民则占 70% 以上^{[9] (P8)},尤其是青岛周边县份胶县、平度、即墨和鲁南的农村移民人数最多。“工人中除了本省人以外,还有来自宁波、上海和广东为数不少的中国南方人。他们在青岛找到的工作多是机械技工、商店店员、服务员、厨师等。”^{[8] (P62)} 这些青岛早期移民及其后代,从事着青岛产业工人、商店员工、车夫苦力等工作,也构成了青岛城市社会职业金字塔体系中人数最众的底层塔基。

二、移民文化的城市植入

异质文化的交错几乎是所有移民城市的共同特征。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本身存在着情感归属、价值判断、社会习俗、行为规范等的差异,他们从其原有的文化习得中获得各自的文化体验与认同,随着其自身的移动,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因子的移民给近代城市移植和传播着不同的文化要素。

德国占领青岛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物质文明在青岛迅速扩散,并在青岛开埠初期具有重要主导地位。无论是青岛城市规划中的建筑景观、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严格规章,还是都市工业的萌发、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承载文化讯息的图书、报刊等,都有着深厚的欧式情调。“官方文件只有在涉及中国人事务的时候才将汉语作为辅助性语言与德语并列出现,地方戏剧只能在天后宫和三江会馆这样的特定场所上演。”^{[10] (P215)} 欧洲的城市休闲方式通过侨民的协会和俱乐部活动,引领着青岛社会时尚。日占时期,占领当局着眼于工业扩张和城市扩展,鼓励移民进入,并开设大量工厂,

市区面积不断扩展,相比德占时期,“扩张至二倍以上”^{[11](P16)}。德占时期的工业创设主要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水、电、灯、交通、砖石有关,与生活消费相关的企业尚少,仅啤酒、缫丝、汽水、面粉、精盐和蛋厂各一处,且主要系官办。日占时期,除面粉、棉纺、油坊等不断扩充,并增设了新的火柴厂、铁工厂、冰厂等^{[3](P847)},而且工厂区范围从台西不断向市区北边的四方、沧口扩散。日占当局一方面注重工业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强了日本文化的渗透,如街道名称全部以日文命名,并将信号山改为神尾山、汇泉公园改为旭公园、小青岛改为加藤岛,在贮水山修建日本神庙,在太平山筑造忠魂碑,移植日本樱花,发行日文书刊。无论是德占还是日据时期,青岛的诸多公共空间渗透着殖民城市的文化气息。西方的文化活动形式和文化机构如钢琴、交响乐、电影、音乐厅、歌舞厅、咖啡馆、俱乐部、跑马场、商场、公园、运动场、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报社、广播电台等应时而兴,充满着浓厚的异国情调与现代氛围。

精英移民带来了他们群体印记,前清官员本身亦是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他们的交流互动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移入与扩展,大批古籍、书画随其传播至青岛,并随着他们的书法、诗词创作活动而在青岛留下久远的影响。刘廷琛的题名有“礼贤中学”“海天如一”等,王埏则书写了大商号“谦祥益”“瑞蚨祥”“裕长酱园”等的匾额及楹联。王埏、劳乃宣等游览崂山,创作了大量诗词如《崂山杂咏》《青岛杂咏》《崂山词存》等。一些前清学者还同德国学者卫礼贤成立了尊孔文社,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文人雅士与区域景观的碰撞不仅在景区及商区留有他们的题名墨迹、诗词作品,更给青岛增添了传统士文化中的雅致风韵,在青岛崂山景区的开发和书画艺术的引入方面贡献甚大。1931年就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主政六年,不仅大力发展工商业,更着力于平民教育事业、发展体育运动、拓展旅游景点、诱掖名人来青岛参观讲学,其主持规划修筑的栈桥回澜阁、华北体育场迄今仍是青岛地标式的建筑,崂山游览区线路的开辟或延长依然泽被后世,市政府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改建平民住所则促进了乡村移民的城市化进程。

1920-30年代大量学术精英在青岛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不仅奠定了青岛高等教育的厚实基础,开拓了青岛的海洋科学和文学创作的研究领域,

而且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丰富了青岛文化活动,提升了青岛城市公共文化的品格。他们创办的各种学术刊物,组织的各类学术演讲和学术会议在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学知识传播的同时,也扩大了青岛在全国的影响。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濡染中外古今不同文化氛围的学者们通过创作、收藏、授课、交流、鉴赏等活动,在青岛传入了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文化,而且影响了青岛人的生活品味与文化鉴赏。

工商业精英大多有在洋行或外国企业工作的经历,或者在本地商海浮沉多年,有着丰富的阅历,更有目光远大、开拓进取、严谨务实的创业品格。他们在纺织业、印染业、制造业、化工业、金融业等领域打下了青岛本土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促进了青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将近代企业管理和运作经验传播到青岛,开创了青岛重商兴业的社会风气。同时,传统商人群中重视地缘亲情的惯习也使青岛商业文化充满着帮派意识,“旧社会,本市商号帮派观念浓厚,一般是从经理到店员多任用本县人。”^{[12](P271)}因而在商业、运输、金融等业中形成黄县帮、即墨帮、掖县帮等以乡族为纽带的工商业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原籍乡民的移居青岛。

社会变迁中涌入的大量农村移民构成了青岛城市普通居民的主体,他们以在农村习得的社会化经验应对城市生活,进城伊始,农村生活方式大量移植到移民的居住空间。种菜、养鸡、拾荒与进厂打工、沿街叫卖并不冲突,他们在繁荣街市与棚屋板房间出入自如,生活的窘迫与节俭的传统使得台东与菏泽路的穷汉市久盛不衰,饮食的偏好和乡土的依恋刺激了家乡菜的引入和家乡戏的传扬。说书场、地摊、地方戏、茶社等传统娱乐场所随着移民的增加而繁荣发展,胶东地区的茂腔、柳腔成为青岛民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山东快书、大鼓、相声、双簧等各种曲艺活动亦流行于娱乐场所和里院杂院中,秧歌、唱戏、年画、剪纸、对联、打秋千、踏青等节庆习俗延续开来。外力引发型的城市化早期生活中的传统与现代、乡土与洋气并存展现了城市包容性、开放性,也形成了鲜明的人口集聚效应。

名流与学者更多是将青岛作为他们人生旅途的驿站,而工商业者与乡村移民则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家园。官员与学者流动性较大,永久留存的是他们给城市的实体符号与他们在城市中的活

动记忆,文人雅士、官宦名流给青岛带来甜蜜的回
忆,却难以给城市文化发展带来厚实的根基。永
久居住于青岛的依然是乡村移民和工商业者,他
们书写了城市的底色,无论政局如何变幻、时事如
何移转,而根植于农工商移民内心深处的勤朴、务
实则凝铸为城市灵魂。

由于各类移民拥有资源的差异,他们给青岛
城市文化的形塑打下不同的印记。一般而言,由
于德日殖民者把持着排他性的各类资源,各类精
英拥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优势,他们构成
了青岛城市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乡村移民
虽是社会资源分配链中的最底层,但以其人数众
多,居留久远,在城市文化中融入了深厚的乡土烙
印与底层经验。

三、异质文化的冲突与渗透

城市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持
续性互动的产物,各类移民将其原有生活方式和
社会规范移植到青岛,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异质
文化的冲突或融合。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
依据移民主体文化态度的不同,将不同文化体系
间互相影响的结果分为四种模式:融合、同化、分
离、边缘化^{[13] (P54-58)},在跨文化交流中又以融合与
分离模式为主。青岛不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不同
的文化类型,如德日占领者携带的异域文化和现
代文化、精英移民传播的现代文化、商业文化与高
雅文化,乡村移民传承的乡土文化。青岛城市化
发展初期,中国与西式文化的对立较为鲜明。而
1929年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与现代
的冲突日益突显。在此过程中,磨合、适应、交融、
渗透逐渐成为移民处理文化困境的主要方式,并
形成青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

德占日据时期,城市的空间隔离和华洋分治
政策使得中西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日常交往并不普
遍,尽管有卫礼贤和劳乃宣等十老会主导的中德
文化的交流场景,但双方主要呈现一种各自体认
原有文化的分离格局。故开埠初期青岛文化的表
现,“一般谓之为德、日、中三国文化的综合。综合
有异于化合,大概德、日的文化,是表现在物质
方面的,如市内多德、日式的建筑;中国文化是表
现在精神方面的,如风俗教育,仍旧依循中国文
化的路线发展。”^{[5] (P152)}在制度文化的建立上,因德
占当局移植了德国法律制度,举凡出行、广告、庆
典、集会、垃圾处理、疾病报告等均有严苛规定,
稍有触犯即有处罚,因而市区中国居民生活在严
密管

制下,也被迫适应城市管理规则。中国与德、日之
间的冲突更多因牵涉到民族国家利益而呈现在政
治舆论中,而在文化层面,占领当局以军事力量与
威权管理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面推行城市规划,中
国居民在拆迁、税收、城市管理方面的抵抗几乎
是无效的,唯一例外的是天后宫的存立之争。德
占当局沿着海岸线进行城市规划,欲拆毁天后宫,
以保持前海景观的一致性,受到众多华商如傅鸿俊、
胡存约等人竭力阻止,天后宫始得以保存,成为
中国民众祈福问吉之所。^{[3] (P480)}日占青岛后,将青
岛的重要地名全部更换,如将小青岛改为加藤岛,
但民众还是称之为小青岛,以示对日本统治的不
满。

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以后,民间组织日形活
跃,基础教育进步较快,民众社会参与意识开始增
强,各种同乡会组织竞相成立,地域文化、家族文
化的传统因子日益呈现。随着1929年后青岛城
市管理的加强,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冲突逐渐明显。
如殷海光所说,“不同的文化之最核心的差别乃
规范特征之不同。许多文化冲突之最后‘决战’乃
规范特征之战。”^{[14] (P59)}乡民们在初次社会化进
程中习得的生存规范并没有得到城市管理制度的
支持,这使得进城农民的生活充满着不适与痛楚。
1930年至1931年间,青岛市加强了治安管理,相
关部门陆续颁布《取缔公共场所吐痰简则》《取
缔各公园维持秩序风俗简则》《取缔饭食物业营
业简章》等条例,对青岛的公共场所秩序、饮食安
全问题等进行规范,这些条例与1928年颁布的
《违警罚法》结合在一起,构成近代城市对居民日
常生活进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但这些法律、法规与
乡民原有的行为模式并不合宜,乡村传统的娱乐
习惯,如玩纸牌、押小宝、推牌九、打麻将、吸鸦
片、唱淫戏等,在城市是被法规明令禁止的事情,
随地吐痰、衣冠不整、沿街闲逛、随地便溺、攀
折花草、倾倒垃圾等乡村日常行为在城市里则
会遭到罚款或监禁,居民们在公共场所不得酗酒、
高歌、吵架、斗殴,没有经过青岛屠兽所宰杀的
肉类不能随便运到市区,到乡村集市购买和从老
家带回的畜肉会被稽查警罚收。乡村移民们“完
美地形成的行为规范进入城市后与新的社会环境
不能适应而妨害了他们自己”^{[15] (P58-59)},同时,
城市生活中接受的新观念也会使他们面临旧习惯
的制约,大量女性因与公婆不睦、受丈夫虐待或
生活艰难而进城,但为他们进城提供便利的乡邻
往往被指控犯有拐卖与霸占罪^[16],一些女性将
城市作为逃避婚姻不幸的

出路,但只要公婆或丈夫起诉,她们便会受到潜逃罪的处罚而被遣返回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乡村移民也逐渐适应城居生活,他们会运用城市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会找到所属的警察驻所,通过正式的治安机构维护自己的权益,受骗者会在醒悟后将行骗者扭送到警所处理,妻子出走或与人私通,家人会到公安局寻求解决之道,有售卖与吸食鸦片者,邻居会主动向警察举报。这与乡民传统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171] (P487)},但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将极大激发移民的文化适应能力,使他们理性地选择城市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

精英移民身处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文化生态格局,如清末民初上海许多商人和企业家那样,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面貌,“涵泳于两者之间”^[18],工商移民既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式,也倚重传统的家族网络、地方资源和官僚关系,政治精英致力于城市现代化建设,也注意吸取传统教育之精华,文化名人既享用现代便捷舒适的生活方式,也沉吟于章句词赋之中。体现了精英群体对不同文化的兼采并蓄,取舍把握。

不同区域的移民在抗拒、磨合、调整中经历动态的文化适应过程,也把传统文化的因子带到城市,影响着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民国政府为提倡新年,各城市均严令废止旧历节日,青岛市社会局和公安局于1933年制订禁止废历年节办法,禁止市民旧历节日休假、贺年、祝神等活动,年终结帐应遵守政府规定的日期。^[19]但市民依然盛行过传统的春节、端午和中秋,对政府提倡的元旦和国庆节并不热衷,旧式杂耍、娱神、庙会、萝卜会等乡土文化活动和仪式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在城市中顽强地生存和延续着。整顿海沿小摊贩的禁令也屡屡失效,简化婚丧礼俗的活动推行困难,改良私塾的计划也一再受阻。平民住房建筑后,种植业和养殖业照常兴起,贫苦的妇女和女孩子们,也都裹着小脚,乡民们进入城市后,原有的方言口音、风尚礼俗和价值观念自然地植入到城市生活中,形成城市文化中的传统底色。

各类移民群体的居住空间相对集中,达官贵人、文化名流、洋商巨贾聚居于前海别墅区和现代化的休闲场所,政府公务员、警察、铁路工人、中小学教师等一般公职人员、技术工人和中等商人等

社会中层则主要群集于大鲍岛和台西较宽敞的平民里院中,城市贩夫走卒、工人、店员、各类贫民则点厠身于各平民院所及棚户板房,他们的日常生活区域分隔于其他不同阶层而更多保持着各自原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公共空间,拥有不同社会资源的移民群体具有不同的支配力度,在城市管理和规划所覆盖的地区,如交通要道、政府部门、商场戏院、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强势力量如外来移民和精英移民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塑造着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形象和行为规范,而在平民百姓汇聚的娱乐休闲、购物场所则由乡村移民植入了各地文化因子而充满着乡土气息与地方风情。居住与休闲空间的隔离使得精英文化与普遍民众间的交流匮乏,随着贵族官员和文化精英移民的离开,他们曾经留下的高雅文化也随之失去凭藉,而成为城市的掌故,百姓的谈资,却难有扎根及拓展。倒是工商精英居留下来,给青岛打下坚实的工业文明根基,为后续青岛工业的腾飞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综上,近代青岛居民基本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移民构成,海外移民植入西方的物质文明、管理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政治精英移民主导了城市规划与制度文化建设,旅青学者引入了精英文化,在城市中心形成鲜明的现代景观,在异质文化的植入过程中,冲突、磨合、适应、交融、渗透逐渐成为移民处理文化困境的主要方式,并形成青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但海外移民、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流动性较强,一定程度影响着青岛名士文化的扎根与制度文化的延续;而大量乡村移民和工商精英成为青岛常住居民,并给青岛带来务实与朴实的城市品格。

参考文献:

- [1]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 [2] Jefferson Jones.The Fall of Tisingtao, Bostonand Newyork[M],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5.
- [3] 民国胶澳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4] 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青岛概览[M].编者,1937.
- [5] 中国市政协会青岛分会.青岛指南[M].编者,1947.
- [6] 青岛市档案馆编.人口资料汇编(1897—1949)[Z].内部刊物.
- [7] 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

- [8] 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
- [9]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行政统计汇编(18年度下期)[Z].编者,1929,公安编.
- [10] 孙德汉主编.青岛文化通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 [11] 叶春墀.青岛概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12] 杨浩春,周岱东.青岛义聚合钱庄[A].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撷英(工商金融卷)[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13]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 [14]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5] 严景耀著,陆桢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16] 拐卖潜逃案卷(1932年)[Z].青岛市档案馆藏,A17-3-1035--1039.
- [17] [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18] 梁元生.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J].史林,1997(1):75.
- [19] 社会公安两局会订禁止废历年节办法[N].青岛时报,1933-01-21(6).

责任编辑:侯德彤

Implant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Impacts of the Immigrants on the Urban Culture of Modern Qingdao

LIU 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China)

Abstract: Qingdao in modern times was a typical immigrant city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converged. The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 introduced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the political elite immigrant dominated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the scholars living in Qingdao introduced elegant culture, and the rural immigrants spread their local customs. In the process of multicultural implantation, controlling, adaptation, integration and penetra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ways the immigrants dealt with their cultural dilemma. Through the diverse cultural impacts, the modern Qingdao gradually took on inclusive, open and pluralistic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extent, the frequent migration of the overseas peopl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migrants affected the roots of elite cultural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and economic elite became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Qingdao which brought a character of practicality and simplicity to the city.

Key words: implantation; integration; immigrant; Qingdao; urban culture